

# “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对 打工收入增长的影响

刘洪银

(天津农学院 人文学院,天津市 300384)

**摘要:**利用全国性大样本调查数据构建多层次 Mincer 打工收入扩展方程。实证分析发现,“农二代”与城市同龄人具有趋同价值观和个人发展诉求,“农二代”不同层级城镇打工对收入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省会及以上城市收入增长影响效果较好,而地级市及以下较差。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等级产生收入增长联动影响,高层级城镇对高人力资本收入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对低人力资本则具有消极影响。高知识技能农民工因其异质性适合在较大范围内流动,而低知识技能农民工因其同质性应适当控制流动距离,更多进入地级及以下城镇打工。当前“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格局尚存在优化空间,政策应扶持家庭创业和多元经营以支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发展。

**关键词:**城镇层级;“农二代”;收入增长;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工作经验

**中图分类号:**C913/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6-0038-08

## 一、研究背景

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简称“农二代”)进城打工的目的呈现出多样性,但增加收入仍然是主因之一。“农二代”具有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三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高出第一代农民工19.2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倾向进入大中城市,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占54.9%,而第一代农民工该比率仅为26%;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目的不是生存所迫而是实现自身发展,该群体追求体面就业,对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和职业声誉具有更高的要求,向往城市生活并期望融入城市社会。2013年,从事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不及第一代农民工一半。<sup>①</sup>由此可见,“农二代”与城市同龄人具有趋同的价值观和个人发展诉求,拥有相近的行业和职业岗位选择偏好。在劳动力相对短缺时期,“农二代”不同类型城镇转移就业及其收入状况将影响城镇化发展。

学者对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多维度研判。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非农就业选择及其收入的主要因素。农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们抓住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而其中人力资本状况对抓住非农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sup>教育和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是有影响的,农民工的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收稿日期:2015-06-25

作者简介:刘洪银,经济学博士,天津农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城融合视阈下稳步城镇化与新生代农民就业转型协同机制研究”(13AJY008),项目负责人:刘洪银。

教育回报率在 5.3% 至 6.8% 之间。简单培训对农民工工资作用不显著,但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工资有重要决定作用。<sup>[2]</sup> 农民非农就业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层次也显著受制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约束。<sup>[3]</sup>

除人力资本外,农民工收入水平还受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受到年龄、性别、婚姻等个性特征以及地域、歧视等其他因素的影响。<sup>[4-6]</sup> 谢嗣胜、姚先国研究认为,农民工 44.8% 的工资差异由个体特征形成,剩余的 55.2% 归结于歧视<sup>[7]</sup>,而城镇居民和农民工收入差异的 60% 是由歧视引起的<sup>[8]</sup>。打工城镇层级不同,农民工预期收入也会不同。劳动力总是流向一种能使他们获得预期收入最高的职业或地理位置。其中,同一个年龄组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流动性更强。地区分割影响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农业部门劳动力配置由于地区分割的影响偏离了比较优势原则。

从以往研究结论看,人力资本及相关因素对农民工收入增长会产生影响已形成共识。但新生代农具有独特的流动和就业选择偏好,农民工流动也就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力资本及其城镇层级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大中城市流动偏好引致大城市人口负荷超载,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人口集聚不足,城镇劳动力配置出现不均衡现象。不同水平人力资本的城镇层级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及其他收入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力资本和城镇层级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产生怎样的联动影响? 进入大城市打工是否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 本研究利用大样本社会调查数据拟合 Mincer 收入方程,试图以实证分析结果解答这一问题。

## 二、模型构建

美国经济学家 Mincer 提出的工资方程已成为研究劳动力收入的经典模型。Mincer 方程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完全由人力资本及其他个体特征决定。但现实中,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善的,人力资本收益通常随劳动力就业的地区、行业、职业及其人力资本相关因素等不同而变化。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但与人力资本等个体属性特征有关,还受其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劳动者综合收入水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函数。

Mincer 发现,随着人力资本投入增加,收入在人力资本各因素边际上呈现指数型增长,因此 Mincer 对收入水平进行了对数转换,这样扩大了收入方程的适应性。可以将难以估算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货币投入成本变为容易估算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还可以将影响收入水平的其他人力资本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中来。Mincer 方程拓展为:

$$\ln(y) + f(sch, exp, X, \epsilon) \quad (1)$$

式(1)中, $\ln(y)$ 为个人收入的对数; $sch$ 代表教育水平, $exp$ 代表工作经验, $X$ 代表对收入增长产生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 $\epsilon$ 是随机扰动项,满足期望值为零的假设。

本研究着重探讨人力资本及其城镇流动层级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在 Mincer 收入方程中除引入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变量外,还引入城镇层级哑变量和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形成 Mincer 收入扩展方程。为减轻多重共线性影响,研究拟构建多个收入扩展方程以比较选择变量作用的稳定性。

李实和丁赛曾在相关研究中引入教育与控制变量的交叉作用项,即  $\sum \alpha_i sch \cdot X$ ,以减小教育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互作用对模型的扰动。交叉变量度量了两个变量的联动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sup>[9]</sup> 人力资本属于劳动者自身的禀赋,农民工进入不同类型城镇打工也就是人力资本沿城镇层级的流动。本研究为考察不同人力资本、不同打工城镇的农民工打工收入增长的差异性,在收入扩展方程中引入教育年限与城镇层级、打工年限与城镇层级两个交叉变量,形成等式(2)。

$$\ln(y) = \alpha_0 + \alpha_1 sch + \alpha_2 exp + \alpha_3 city + \alpha_4 sch \times city + \alpha_5 exp \times city + \sum \alpha_i X + \epsilon \quad (2)$$

###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 (一)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天津农学院课题组 2014 年 3 月—6 月对全国城镇“农二代”进行的问卷调查。<sup>①</sup> 调查对象为 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地区涉及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山东等)、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和上海)、珠三角地区(广东、福建)及部分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回收有效问卷 3 402 份。其中,北京市 737 份,天津市 1 195 份,山东省 442 份,长三角 469 份,珠三角 510 份,其他地区 49 份。样本概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概况

变量	比例(%)	变量	比例(%)	
性别	男性	43.0	一般地级市	16.5
	女性	57.0	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	8.0
年龄	80 后	63.4	直辖市	51.6
	90 后	36.6	打工类	72.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7.4	开办企业	10.1
	初中	40.5	个体经营	17.7
	高中(含中职)	32.3	体力性岗位	51.9
	大专(含高职)及以上	19.8	岗位类型	30.9
打工地区	北京	21.7	技术性岗位	17.3
	天津	35.1	管理性岗位	17.3
	山东	13.0	5 年及以下	60.3
	长三角	13.8	打工年限	31.3
	珠三角	15.0	6~10 年	8.4
打工城镇	其他	1.4	11 年及以上	8.4
	小城镇	11.1	2 000 元及以下	10.9
	县级市或县城	13.1	2 001~3 000 元	34.0
			3 001~5 000 元	39.9
			5 001 元及以上	15.2

#### (二)变量选择

为研判进城“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与其人力资本、所在城镇层级等之间的函数关系,诊断城镇层级对打工收入增长影响的差异性,本研究选取表 2 所示的变量。

表 2 变量选择

变量类型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及缩写
因变量	打工收入	进城“农二代”小时工资、小时总收入
	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sch);打工年限(exp)
自变量	打工城镇	城镇类型:县级市(县城)、地级市、省城(计划单列市)、直辖市;打工地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
	就业变量	就业方式:就业、创业;岗位类型;培训;劳动歧视
	个性特征	年龄;性别

如表 2 所示,变量分两类:数值变量和属性变量。数值变量包括作为因变量的劳动收入和作为自变量的人力资本、培训时间和年龄。其他变量为属性变量。

劳动收入分为两类:进城“农二代”小时工资收入和小时总收入(工资收入加上其他收入。经济学意义上的工资含义是指小时工资)。本研究以这两类变量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计量分析。人力

① 该调查是作者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组织开展的全国性问卷调查。

资本变量用教育水平和打工年限度量。教育水平指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正规教育水平。为减轻多重共线性,本研究将教育水平分为数值变量和二元属性变量(小学及初中记为 0,高中及大专以上记为 1)两类(交叉变量中采用数值变量);打工年限用农民工累计打工年数表示。培训时间指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参加职业培训的月数。

城镇层级变量是属性变量。城镇层级是指不同类型城镇按照行政级别从低向高的排列,低层级城镇指小城镇、县级市(县城),高层级城镇指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本研究将打工城镇层级分为哑变量和二元变量两类。城镇层级哑变量是以小城镇为参照组,包括县级市(县城)、一般地级市、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直辖市四个哑变量的一组属性变量。二元属性变量将一般地级市及以上记为 1,县级市(县城)及以下记为 0(交叉变量中采用属性变量)。城镇所在地区是以中西部地区为参照组,包括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三个哑变量的一组属性变量。

就业变量为属性变量。就业方式是以个体经营为参照组,包括打工和创办企业两个哑变量的一组变量。岗位类型变量将技术和管理型岗位记为 1,体力型岗位记为 0。劳动歧视变量将“工资差距较大”记为 1,“一般、较小及以下”记为 0。

## 四、实证结果分析及讨论

### (一)实证结果

针对工资收入和总收入两个因变量分别建立 Mincer 工资扩展方程和收入扩展方程。为检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梯次影响和降低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根据式(1)在 Mincer 方程中梯次引入城镇类型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分别构建模型 1 和模型 2,根据式(2)构建模型 3。

实证分析过程中发现,如果保留截距,所建模型均不显著。如果截距为零,即人力资本收入线经过原点,所建模型显著性水平均较高。由于观测值是截面数据,工资增长率实际上度量了农民工工资的差别率。截距为零也就是工资观测值间没有固定的差别率。农民工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变化,由于农民工群体同质性较高,个体间劳动生产率差别不大,小时工资相对趋中。虽然月工资收入存在一定差别,但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加班加点形成的,折合成小时工资则差别不大。鉴于此,本研究拟构建不包含截距项的 Mincer 收入方程。

由于调查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数值相对趋中,容易与其他变量形成多重共线性。模型保留了教育年限和打工年限两个数值变量,剔除了年龄变量。为进一步消除共线性问题,教育水平在单变量中采用二元属性变量,而在交叉变量中采用数值变量。城镇层级类型在单变量中采用哑变量,而在交叉变量中采用二元属性变量。

城镇“农二代”Mincer 工资和总收入扩展方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模型拟合优度较高,D-W 值趋近于 2,模型相对稳定。各变量(“环渤海”变量  $VIP=15$ ,存在轻微共线性),模型总体共线性问题可控,所建模型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所有变量均在 1%水平下显著。城镇层级与打工年限交叉变量不显著且引起共线性问题,从模型中剔除。回归结果显示,分别以工资与总收入为因变量的两类扩展方程中,自变量的作用方向大体一致,只是作用系数存在一定差别,其中,“培训时间”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别明显,变量对总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接近工资增长的两倍。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1. 城镇层级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从表 3 看出,以小城镇为参照组,各层级城镇对农民工收入增长均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不控制其他变量模型 1 显示,随着城镇层级提高,打工城镇对收入增长影响效果呈 U 型变化。以小城镇为参照物,县级市与直辖市的收入增长影响效果较好,达到 1.9 左右。而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含单列市)较差。

表3 Mincer 扩展方程的回归分析结果  
(分析方法:OLS, SPSS19.0;因变量:ln(y))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y=工资	y=总收入	y=工资	y=总收入	y=工资	y=总收入
教育水平	0.462***	0.486***	0.068***	0.074***	0.142***	0.148***
打工年限	0.096***	0.098***	0.020***	0.020***	0.054***	0.054***
打工城镇类型:						
县级市、县城	1.855***	1.900***	0.256***	0.273***	0.225***	0.242***
一般地级市	1.739***	1.783***	0.240***	0.259***	0.461***	0.480***
省城、单列市	1.727***	1.740***	0.391***	0.401***	0.619***	0.630***
直辖市	1.901***	1.930***	0.334***	0.349***	0.561***	0.576***
小城镇(参照组)						
打工地区:环渤海			1.946***	1.946***	1.765***	1.765***
长三角			2.100***	2.146***	1.926***	1.971***
珠三角			1.881***	1.848***	1.710***	1.676***
其他地区(参照组)						
就业方式:打工			0.203***	0.209***	0.181***	0.186***
创办企业			0.229***	0.247***	0.225***	0.243***
个体经营(参照组)						
岗位类型			0.194***	0.220***	0.195***	0.220***
培训时间			0.020***	0.037***	0.020***	0.036***
劳动歧视			-0.159***	-0.152***	-0.164***	-0.157***
City * sch					-0.004***	-0.004***
AdR <sup>2</sup>	0.893	0.893	0.961	0.961	0.962	0.962
F	4746.0	4725.8	6007.4	6031.4	5771.8	5789.2
Durbin-Watson	1.213	1.217	1.323	1.322	1.364	1.364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直辖市收入增长效果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样本中直辖市(北京市和天津市)均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物价水平较高,成本推动和收益分享推动工资上涨。第二,“农二代”就业观念发生改变,直辖市企业不得不提高苦脏累险岗位的薪酬水平,“农二代”补偿性工资提高。第三,直辖市打工就业相对稳定。针对同一调查样本的有序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进入更高层级城镇(尤其直辖市)后,工作转换次数减少,打工就业更趋稳定。稳定就业有助于工资增长。<sup>[10]</sup>

县级市占据地利和人和优势,农民工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禀赋,有助于稳定就业和实现创业,有助于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样本中县级市农民工从事技术或管理岗位的比率为50%,地级市及以上则为47%;县级市“农二代”创办企业的比率为20%,而地级市及以上仅为7%,远低于县级市水平。不但如此,县级市政府承担本地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责任,农民工参训频率较高。样本中县级市农民工年人均参训1.09个月,而地级市及以上农民工仅为0.83个月。

梯次引入打工地区和就业方式等控制变量后(见模型2),打工城镇类型对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效果均大大降低,出现两个阶层:省城(含单列市)和直辖市影响效果较好,县级市和一般地级市较差。直辖市样本占到51.6%且均位于东部地区,收入增长较快的东部地区哑变量分解了直辖市的作用效应。县级市因为控制了就业类型、岗位类型和培训时间等有利变量,收入增长影响效果位次降低。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在控制了劳动歧视等不利变量后,“农二代”收入增长影响效果位次得以提高。

## 2. 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对“农二代”打工收入的增长产生联动影响

控制了城镇层级和教育年限联动作用变量后,地级及以上高层级城市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效果均明显提高,而县级及以下低层级城镇的影响效果不增反降,说明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产生了联动影响,高层级城镇影响效果的提高和低层级城镇影响效果的降

低均源于交叉变量的联动作用。交叉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收入增长影响系数为-0.004,表明相对于低层级城镇,高层级城镇对不同人力资本的“农二代”收入增长产生弱消极影响。为进一步检验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的联动影响,本研究选取“小学及以下”和“大专(高职)及以上”两个样本分别作为独立总体进行回归模拟。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特定样本 Mincer 总收入回归结果**  
(分析方法:OLS,SPSS19.0;因变量:ln(小时总收入))

样本 变量	小学及以下		大专(高职)及以上	
	系数	VIF 共线性检验	系数	VIF 共线性检验
打工年限	0.003	4.210	0.020***	3.309
培训次数	0.039	1.419	0.057***	1.818
打工城镇:	0.317**	2.164	0.554***	2.016
县级市、县城	0.387***	2.032	0.605***	3.334
一般地级市	0.370**	1.217	0.809***	1.833
省城、单列市	0.254**	4.952	0.588***	7.183
直辖市				
小城镇(参照组)				
打工地区:北京	2.117***	6.430	1.777***	1.737
天津	1.790***	6.531	1.614***	8.566
山东	1.757***	4.284	1.486***	4.480
长三角	1.818***	2.636	1.871***	3.587
珠三角	1.691***	2.084	1.571***	2.598
其他地区(参照组)				
就业方式:打工	0.434***	5.938	0.205***	3.761
创办企业	0.509***	2.577	0.272***	1.766
个体经营(参照组)				
岗位类型	0.276***	2.181	0.349***	4.051
AdR <sup>2</sup>		0.956		0.959
F		359.4		1134.3
Durbin-Watson		1.626		1.625
样本数		252		673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4可以看出,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小学及以下群体打工城镇的收入增长影响系数均大大低于大专及以上群体。以小城镇为参照组,小学及以下“农二代”从一般地级市到直辖市,打工城市层级越高,收入增长影响效果越差,表明高层级城镇对低人力资本收入增长具有消极影响;而大专学历及以上“农二代”从县级市到省城(含单列市),打工城市层级越高,收入增长影响效果越好(直辖市例外),表明高层级城镇对高人力资本收入增长具有积极影响。样本显示,从低层级城镇流入高层级城镇,小学及以下“农二代”收入明显降低,大专及以上明显提高,而初高中提高不明显。低人力资本“农二代”进入高层级城镇打工,即使提高了名义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的空间也有限。高人力资本“农二代”打工城镇层级越高,越能够充分释放劳动力价值。由此可以推论,知识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因其异质性适合在较大范围内流动,可以进入较高层级的城市打工,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因其同质性应适当控制流动距离,更多进入地级及以下城镇打工(县城以下劳动需求有限),这样可以降低流动成本。相反,远距离的跨区域流动将无助于收入大幅增长。这是源于大城市的高技术产业与高知识技能劳动力呈互补关系,而与低知识技能劳动力呈替代关系,低知识技能农民工大城市收入增长潜力较小。一般而言,城镇行政层级越高,物价水平也越高,知识技能水平较低的“农二代”流入高层级城市主要源于货币幻觉。样本显示,直辖市和省城(含单列市)中初中及以下“农二代”占到50.4%,而地级市及以下城镇中高中及以上“农二代”占到55.8%，“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格局尚存在优化空间(表5)。

表 5 不同教育水平“农二代”的小时总收入(元)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学历
低层级城镇(县城及以下)	17.21	16.33	15.96	17.50
高层级城镇(地级市及以上)	15.70	16.45	16.00	19.40

### 3. 城镇层级对“农二代”收入增长作用效果受打工地区影响

当控制打工地区变量后,城镇层级对“农二代”收入增长影响效果大打折扣,表明打工地区对城镇层级的收入增长效果产生显著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城镇对农民工收入增长产生积极的显著性影响,收入增长影响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 4. 其他变量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城镇“农二代”收入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教育水平采用二元属性变量代替教育年限,夸大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果。

就业类型对“农二代”收入增长影响存在差异性。与个体经营相比,创办企业对农民工工资及总收入产生显著性影响。

岗位类型对“农二代”收入增长产生显著性影响。相对于体力性工作,技术和管理岗位影响系数较高,但进城“农二代”中一半以上从事体力性工作,这限制了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

职业培训对城镇“农二代”总收入增长的作用系数接近工资收入增长的两倍,表明进城农民工职业培训不但有助于工资增长,更有利于总收入的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不但应着眼于就业实现和劳动技能提升,更应该提升农民工创业技能和创业水平。

劳动歧视对城镇农民工工资和总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与城镇劳动力相比,同工不同酬现象抑制农民工工资增长。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遭受的歧视没有减少,但与城市同龄人收入和财富积累水平差距却在拉大。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受教育程度较高,追求体面就业,倾向进入大中城市并期望融入城市社会,与城市同龄人具有趋同的价值观和个人发展诉求。忽略个体间差异性,“农二代”在不同类型城镇打工可以近似看作农民工沿城镇层级流动和就业。“农二代”沿城镇层级流动对打工收入增长产生显著性影响。不控制其他变量,打工城镇对收入增长影响效果随城镇层级提高呈U型变化。直辖市样本位于收入增长效应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农二代”就业相对稳定,名义工资较高。县级市农民工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禀赋,从事技术或管理岗位比率较高,参训频率和创业率显著高于地级及以上城市。当控制了相关单变量后,不同层级城镇对“农二代”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大大降低,出现省城(含单列市)和直辖市影响效果较好、县级市和一般地级市较差两个层级。进一步控制了城镇层级和教育年限交叉变量后,高层级城市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影响效应明显提高,而低层级城镇的影响效果不增反降,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产生联动影响。高层级城镇对高人力资本收入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对低人力资本则具有消极影响。源于高层级城镇的高技术产业与高知识技能劳动力的互补关系,知识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因其异质性适合在较大范围内流动,可以进入较高级别的城市打工,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因其同质性应适当控制流动距离,适合进入地级市及以下城镇打工。当前“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格局尚存在优化空间。

### (二)政策建议

#### 1. 以新兴产业集群大力培育和发展中等城市,提升地级市城市功能和收入水平

我国中小城市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应突出发展中等规模的城市。小城市规模不经济,大城市规模收益递减。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50万,规模经济将完全消失。100万人

口以下的中等规模城市处于规模经济持续期。按照新的划定标准,目前我国 283 个地级市中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各占一半。中等规模的地级市和百强县应是发展重点。中等城市产业规划应将高附加值的节能环保、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培育壮大专业化新兴产业集群,快速提升中等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就业容纳力和收入水平。

## 2. 以家庭创业和多元经营支撑小城镇和小城市发展,提高小城镇就业吸纳能力

支柱产业缺失和非农就业机会缺少是制约小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小城市和小城镇连通农村与城市,是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理想场所。地方政府财税金融政策应向农村倾斜,鼓励农民家庭式创业,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农村养老服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规划建设市镇工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特色产业镇、工业品牌镇、商贸物流镇等各类专业特色小城镇,为人口与就业的增长提供产业支撑。

## 3. 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高层级城市产业升级转型

“农二代”注重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就业偏好倾向摆脱身心健康损害和追求体面就业,农民工用脚投票必然抬高企业用工成本,倒逼产业升级,传统制造业不升级即淘汰。高层级城市产业升级应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第一,吸纳国外资本和智力参与高层级城市新兴产业如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产业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设计,深度融合技术和新型产品,促进城市产业升级。第二,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建议将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和团队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率从 50% 提高到 70% 以上。第三,贯彻落实农民工与城市人同工同酬和工资正常增长的法规政策,构建劳动力成本倒逼产业技术创新保障机制。

## 4. 加强城市外来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农二代”就业质量

“农二代”就业质量提高的关键在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就业稳定性、就业层次和劳动收入。2009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跟踪调查”显示,接受过非农职业教育培训的外出劳动力稳定就业率达到 72.3%,未接受教育培训的劳动力该比率仅为 59.6%。输入地城市对外来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动力不足,国家应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输出地政府、输入地城市和用工企业共同承担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责任。输出地政府应依托中高职学校,分别对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进行 1~2 年的免费职业教育;输入地城市按照产业发展规划确定紧缺专业技术,安排年度培训计划;用工企业借力城市财政补助开展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

### 参考文献:

- [1] 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 经济研究,1999(6):71-80.
- [2] 王德文,蔡昉,张国庆. 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 经济学季刊,2008(4):1131-1148.
- [3] 姚先国,俞玲. 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J]. 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6-22.
- [4] Chiswick B. The Effects of Americanization on the Earnings of Foreign-born Me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5):897-921.
- [5] Kanbur R, Zhang X B. 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and Inland-Co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1983-1995[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9(27):686-701.
- [6] Zhao Y H.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4):767-782.
- [7] 谢嗣胜,姚先国. 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6(4):49-55.
- [8] 邓曲恒. 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 Oaxaca-Blinder 和 Quantile 方法的分解[J]. 中国人口科学,2007(2):8-16.
- [9] 李实,丁赛. 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2003(6):58-61.
- [10] 刘洪银.“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对就业改进的梯次影响[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4):39-46.